乡村转型视角下德国乡村旅游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产业—空间—制度”的分析框架

孙宇涵，李文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9）

摘 要：在全球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背景下，乡村旅游日益成为推动乡村转型与重塑乡村功能的重要路径。乡村旅游并非乡村转型的既定目标或简单的产业替代，其发展成效取决于能否嵌入农业生产体系、乡村空间结构及多层级制度安排中。基于乡村转型理论，构建“产业功能嵌合—空间单元重构—制度层级建构”的分析框架，系统考查二战以来德国乡村转型进程中乡村旅游的发展逻辑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德国乡村旅游并非在乡村衰退背景下被动引入，而是在农业现代化、城乡关系重组与多层级治理持续演进过程中，与乡村转型同步生成、相互嵌入的一种实践形态。产业层面，乡村旅游通过农业多功能化实现与农业生产的深度嵌合；空间层面，乡村旅游推动乡村由分散项目向以村庄和区域为核心的整体空间单元转型；制度层面，欧盟、联邦、州及社区多层级政策通过长期财政支持与规则约束，为乡村旅游发展设定边界并稳定乡村转型路径。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是国家变迁与乡村转型在乡村空间中的具体呈现，为从长时段和结构性视角理解乡村旅游与乡村转型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也为中国审视乡村旅游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视角。

关键词：乡村转型；德国；乡村旅游；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F323；F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89(2026)01-0105-09

一、引 言

在全球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背景下，乡村地区正在经历由单一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并重的复合空间转型。在此过程中，乡村旅游日益成为推动乡村转型与重塑乡村功能的重要路径。如何实现产业功能重组、空间形态优化与制度安排之间的稳定衔接，成为乡村转型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核心议题。在不同国家情境中，乡村旅游嵌入乡村转型的方式及其制度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德国作为较早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长期面临农业人口减少与乡村功能重塑压力的国家，其乡村旅游发展并未走向“去农业化”或高度资本化，而是通过制度化引导，实现旅游、农业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相互嵌合。这一经验为理解乡村旅游如何在不削弱农业基础、不破坏乡村空间秩序的前提下参与乡村转

*项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22YJA71001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科研创新项目(2024JX0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5KSB006)。

作者简介：孙宇涵，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国政策。

通信作者：李文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德国政策。

型，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案例。基于此，本文以德国为研究对象，借助“产业—空间—制度”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乡村旅游在乡村转型中的运行机制，以期为相关国家和地区理解乡村旅游与乡村转型的内在逻辑提供参考。

二、乡村转型视角下的理论框架与分析路径

在全球尺度上，乡村转型成为理解当代发展模式重构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议题。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世界各国乡村普遍经历农业比重下降、人口流动加剧与功能结构重组过程，其核心并非“乡村衰退”这一表象，而是乡村在经济、空间与制度层面重新被纳入国家发展体系的方式变化。相关研究表明，当前乡村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其一，农业虽在经济结构中占比下降，但通过技术进步、功能拓展与多元经营实现转型升级；其二，乡村空间由单向的人口输出地，逐步转变为兼具居住、休闲与生态价值的重要载体；其三，国家通过公共政策与多层级治理重新介入乡村发展过程，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的同时，防止乡村被边缘化或过度资本化[1]。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乡村旅游被视为连接产业转型、空间重构与制度调节的重要实践形式，其发展逻辑有必要置于更为整体的乡村转型框架中加以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英国乡村在“去工业化”与全球化背景下面临持续重构，Marsden、Newby、Whatmore 等学者在乡村研究中逐步形成关于“乡村重构与转型”的分析视角，强调资本、劳动力、土地与制度等要素重组对乡村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的深刻影响，并将乡村变化理解为一种由结构调整推动的“社会—经济”重构过程[2-4]。此后，这一理论视角被广泛应用于不同区域情境：以瑞典、挪威为代表的北欧国家在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过程中，逐步进入以多功能发展为特征的乡村转型阶段；而南欧及大洋洲国家则在农场经济危机与旅游业扩张的推动下，形成以消费化与功能重组为导向的乡村转型路径，如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5]。

乡村转型理论认为，乡村变迁并非由单一产业扩张或单项政策干预直接触发，而是在特定历史与制度情境中，经济结构调整、空间组织重构与治理方式变迁相互作用、持续演化的结果。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乡村研究为代表，相关研究强调资本、劳动力、土地与制度安排的重组过程，指出乡村正在经历由生产主义向多功能方向转变的结构性重构，国家调控与市场力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6-7]。

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乡村转型被进一步理解为空间意义、地方认同与日常实践持续重塑的过程。相关研究关注乡村空间如何在居住、休闲与消费等新功能嵌入下被重塑，强调“地方性”（Locality）与“乡村性”（Rurality）并非既定属性，而是在社会实践、话语建构与空间使用中不断生成的结果[8-9]。这一视角凸显了乡村转型的差异性与非线性特征，揭示乡村旅游等活动不仅改变经济结构，也深刻影响乡村空间形态与社会关系。

从农村区域发展视角看，乡村转型则被置于更广阔的区域经济与治理体系中加以理解。该视角强调乡村发展并非孤立发生，而是嵌入区域分工体系、城乡网络与多层级政策框架之中，其转型路径受到制度能力、区域资源禀赋与政策工具组合的共同影响[10-11]。在欧洲情境下，这一研究传统尤为重视欧盟与国家层面的农村发展政策、地方行动网络以及内生发展机制对乡村转型稳定性的塑造作用。

综合上述视角，乡村旅游并不等同于乡村转型的终点或预设目标，而是一种嵌入乡村结构性重构过程中的实践形态，其发展实效取决于能否与农业生产体系、乡村空间结构及多层级制度安排形成稳定而协调的耦合关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具体构建“产业功能嵌合—空间单元重构—制度层级建构”分析框架，以解释德国乡村旅游在乡村转型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其中，“产业功能嵌合”强调以家庭农场为基础推动农业多功能化；“空间单元重构”关注乡村旅游对乡村空间组织与地方实践的再塑造；

“制度层级建构”则从多层级治理视角，分析欧盟、联邦、州及社区制度如何通过长期支持与规则约束，为乡村旅游发展设定边界并稳定乡村转型路径。基于这一框架，本文将结合德国制度背景与具体实践，对乡村旅游在经济、空间与治理层面的转型机制展开进一步分析。

三、德国乡村转型与乡村旅游发展的时空演进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乡村转型进程与制度逻辑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后，德国乡村发展经历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深刻转型，其演化过程与国家经济重建、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城乡关系重塑紧密交织。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耕作方式变革，德国乡村的核心功能逐步从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兼具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休闲旅游等多重功能的综合空间[12]。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农业自身的转型，也反映出德国社会对乡村价值认知的根本性变化。

从宏观背景看，战后联邦德国（西德）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但城乡之间、联邦各州之间，以及联邦德国（西德）与民主德国（东德）之间的发展差异长期存在。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下降、土地规模调整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传统乡村景观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东德与西德乡村转型路径的分化尤为突出。原东德乡村地区在社会主义体制下，通过农业集体化实现农田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和农民“工人化”，乡村社会结构与空间形态高度制度化；而1990年德国统一后，东德这一模式难以适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及市场竞争环境，导致农业就业锐减、人口外流加剧，部分地区出现明显的乡村衰退问题。相比之下，原西德乡村地区在战后经历了不同的转型轨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高峰之后，随着工业分散化和交通条件改善，乡村地区逐步承接工业转移和人口回流，出现逆城市化趋势。许多乡村由传统农村聚落转变为兼具居住、就业与生活功能的现代化定居点。这种以功能改善为导向的乡村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城市化空间形态的扩张，直线化道路、标准化建筑削弱了乡村原有的聚落结构与景观特色[13]。

从政策与规划视角看，战后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是德国乡村现代化的奠基阶段。政府通过农业复兴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发展，土地重整（Flurbereinigung）成为乡村规划的核心工具。这一时期，乡村规划不仅是政府干预乡村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提高农业效率、改善乡村生活条件的关键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德开始系统制定乡村发展与更新规划，标志着乡村政策导向从单一生产转向综合发展。“我们的乡村应更美丽”（Unser Dorf soll schöner werden）行动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其目标不仅包括提高农产品质量与多样性，还强调农业空间优化、乡村旅游和环境改善[14]。通过对村庄形态、自然环境、聚落结构与建筑风格的整体规划，逐步实现从传统乡村向现代化、生态化乡村的转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可持续发展理念进一步融入德国乡村发展实践。政府在“村庄更新计划”和“农村发展计划”框架下，强调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鼓励地方主体通过创新项目，参与乡村治理与产业转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态保护、文化景观维护以及休闲旅游被纳入乡村发展的核心目标，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休闲价值逐渐与经济价值并列，成为政策评估的重要维度[12-13]。

（二）德国乡村旅游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既受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驱动，也体现为乡村转型过程中产业功能重构、空间单元调整与制度层级建设的相互促进。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为理解乡村社会转型、制度创新和地方治理提供了重要视角。

1. 战后初期至20世纪中期：乡村旅游的萌芽与初步实践

德国乡村旅游的早期雏形与战后社会大众休闲方式的变化密切相关。随着居民收入提高、带薪休假制度普及，乡村自然景观、文化遗产和休闲路线开始吸引城市居民的注意，乡村地区逐渐成为休闲目的地。典型例证如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浪漫之路”（Romantische Straße），其作为串联巴伐利亚州与符腾堡州风景名胜与历史聚落的一条主题路线，早期就呈现出乡村与文化、旅游相结合的特色。这条路线自1950年构想以来逐步发展为德国南部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并带动周边乡村的旅游就业与经济活力[15]。类似的主题路线如“木框架之路”（German Timber-Frame Road）和“童话路”（German Fairy Tale Route）等，也体现出通过文化景观与历史元素串联乡村空间的旅游实践。作为德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早期典型案例，这一阶段主要依托自然体验与文化路线进行开发，对乡村空间功能的改变相对温和，为后续乡村旅游与乡村现代化、空间重构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实践基础。

2.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乡村旅游的制度化推进与政策整合

进入20世纪末，德国乡村旅游的制度支持逐渐加强，并被纳入更高层次的乡村发展政策体系。德国作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其国家和各联邦州在旅游和区域发展政策上不断强调提升乡村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活力，乡村旅游成为促进区域平衡、创造就业机会和稳定人口结构的重要支撑。根据OECD相关政策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乡村地区占德国国土面积约60%且承载约32%的旅游住宿容量，因此“加强乡村旅游”被明确纳入国家旅游政策重点，以提升就业和区域活力[16]。

这一阶段，乡村旅游与乡村空间、文化保护等政策目标相互融合。地方政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乡村公共服务、发展民宿与创新体验项目等方式，使乡村旅游不仅满足传统游览需求，也越来越强调对地方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融合。作为乡村转型整体过程的一部分，这一制度化推进有助于强化乡村旅游在乡村社会结构调整、功能重构中的作用发挥。

3. 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与重振实践

21世纪以来，德国乡村旅游与空间功能重构的融合更加明显。乡村旅游成为激活乡村经济、提升地方认同、保护文化与生态资源的重要策略。当前，在德国不同区域的乡村旅游实践中，不同模式并存。例如，东部地区的乡村旅游更多依托地方资源优势与社区参与策略，西部和南部地区的乡村旅游则逐渐融入生态保护、文化景观推广与休闲体验等多元目标，形成“乡村生活体验+文化价值发现”发展路径。对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政策引导与社区参与是德国乡村旅游成功的关键因素。多层级治理模式（联邦、州、社区）有效协调产业发展、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而政策资金与地方实践结合是乡村旅游创新的核心动力。地方民众通常对乡村旅游持支持态度，尤其是在参与项目规划和社区经营后，认为乡村旅游不仅增加就业机会，也强化了社区凝聚力和地方认同感[17]。

当前，德国乡村旅游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观光活动，而是强调景观体验、文化参与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综合性实践。这与乡村产业多元化、生态价值提升和社区参与的转型趋势相符，体现了乡村从传统农业空间向多功能复合生产生活空间的演化。乡村旅游不仅为乡村经济注入新动力，还体现了德国乡村在面对结构性挑战时，通过制度创新与地方治理实现“被动衰落”向“主动转型”的路径选择。

四、德国乡村转型与旅游发展互动的“产业—空间—制度”分析

乡村转型理论认为，当代乡村的发展不再依赖单一产业替代或局部改造逻辑，而是通过产业功能嵌合、空间单元重构和制度层级建构，实现乡村经济、社会与治理结构的系统性转型。在这一理论框

架下，德国农业与旅游融合发展不只是零散的产业创新或短期经济行为，而是一种以农业多功能化为核心、以村庄及区域空间为载体、深度嵌入多层级制度体系的乡村转型实践。围绕“产业功能嵌合—空间单元重构—制度层级建构”的分析框架，系统探讨德国乡村旅游与乡村转型互动的机制、路径与经验，为理解乡村空间功能变迁和制度创新提供案例支撑。

（一）产业功能嵌合：农业多功能化背景下的乡村旅游发展

从产业层面看，德国农业发展与旅游的融合首先体现为农业生产功能的系统性延伸与嵌合。在欧洲农业转型的整体背景下，农业不再被界定为单纯的初级产品供给部门，而是逐步被纳入区域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服务的综合体系。农业与旅游的融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成为农业多功能化（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传统意义上对农业经营的补充性活动。

德国农业与旅游协同融合发展较早，产业形式比较成熟。早期以农场度假模式（Urlaub auf dem Bauernhof）为典型代表。农场度假模式，是指通过农业生产实践与农家生活环境为游客提供深度体验与服务，以农场的农业资源包括土地、农作物、家畜等为基础，游客可参加与之相关的农事活动。农场度假模式的运营者一般是独立的农场主，多以家庭为单位，强调主人与游客之间的互动，使游客体验真实的农场生活。旅游区的农场度假经营为当地农村家庭带来额外且较为稳定的收入，不仅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就业岗位，还保留了农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乡村景观和原生态环境。巴伐利亚州是农场度假模式的代表地，度假农场数量居德国首位。全州约有1 300余家农场参与农场度假经营，形成较为稳定的专业化供给体系。该州农场度假每年过夜游客量在1 200万人次以上，可见其在区域旅游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18]。

巴伐利亚州农场度假模式的发展，强调服务质量与专业能力的持续提升。通过面向从业者开展定制化、针对性的专业培训，夯实农场度假产品与服务品质稳定提升的人才基础。同时，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强化制度建设和品牌建设，将农场度假与健康休闲等功能定位相结合，有效引导并扩大相关市场需求[19]。近年来，“研学+农场”教学模式（Bauernhofpädagogik）发展迅速。通过与学校、家庭及社会团体合作，农场转变为面向公众的实践学习空间。儿童可通过近距离接触和喂养小动物，亲身到田间劳作获得独特体验。这一模式在增加农场收入的同时，也深化了公众对农业的认识[20]。在制度与市场双重作用下，农业经营主体在开展农场度假项目时，不再局限于住宿功能，而是通过与餐饮服务、教育研学、节庆活动及户外休闲等深度融合，逐步构成复合业态[21]。农业经营主体的角色也由单一生产者转变为服务提供者、文化传播者乃至地方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参与者，体现产业功能嵌合对乡村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

（二）空间单元重构：从个体项目到村庄与区域的整体整合

在产业功能嵌合的基础上，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乡村空间单元重构。乡村转型理论认为，产业多功能化不仅表现为经营内容的横向拓展，更体现在空间组织尺度与治理单元的演变，即由单个经营主体或独立项目为核心的点状布局，逐步转向以村庄乃至跨村域为载体的综合性空间单元。在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由“项目空间”向“功能单元空间”的转变表现尤为显著。

葡萄酒旅游、骑行与马术旅游，最初多以酒庄、农场或单一路线为基本空间载体，呈现出典型的点状或线状分布特征。随着旅游功能的强化，这类活动逐步通过主题路线、区域品牌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被嵌入更大尺度的空间组织。例如，莱茵高葡萄酒路线（Weinstrassen），并非简单串联若干酒庄，而是以产区整体为规划单元，将农业景观、村庄聚落、住宿设施与公共服务系统纳入统一的空间框架，并由州级部门与行业协会协同推进品牌与空间治理。骑行与马术旅游的发展同样体现了空间单

元尺度的外延化。通过连续性的步道网络，原本相对分散的村庄、农场与自然景观被整合进跨村镇的功能空间之中，形成以路线为纽带、以村庄为节点的网络化空间结构[22]。例如，下萨克森州“Bett & Box”项目中农场不再作为孤立的接待点存在，而是被纳入区域性马术旅游网络，其住宿、服务与文化功能依托村庄与周边空间共同实现[23]。

在此基础上，德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的意见领袖进一步将“村庄”明确界定为整体旅游和发展的空间单元，提出“Destination Dorf”，即“把村庄当作目的地”的规划理念。2008年，萨克森州环境、农业和地质办公室提出，通过主题聚焦和社区参与将分散于农场、路线和个体项目层面的农旅活动，整合为以村庄为基本治理单元的综合性空间体系[24]。主题村（Themendorf）和体验村（Erlebnisdorf）不仅成为农旅融合空间重构的重要形式，更承担起空间规划、形象建构与公共资源协调的功能[25-26]。

由此可见，德国乡村旅游的空间转型并非简单回归“以村庄为中心”的传统模式，而是通过尺度扩展与功能整合，使村庄由农旅活动的发生地转变为统筹多元业态、连接项目与区域的关键空间单元。这种以村庄为节点、以区域为支撑的空间单元重构，使旅游活动嵌入乡村日常生活与治理体系，为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层次及增强区域整体认知度提供了空间基础。

（三）制度层级建构：多层级治理下的乡村旅游保障机制

产业功能嵌合与空间单元重构之所以能够稳定推进，关键在于德国乡村旅游发展背后高度协调的制度层级建构。欧盟层面，欧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总司（DG AGRI）依托CAP第二支柱及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EAFRD），为农村地区提供长期财政支持，并通过LEADER/CLLD网络强化地方创新能力与社会资本建设。在2021—2027多年度财政框架中，欧盟CAP总预算约3 866亿欧元，其中用于农村发展（第二支柱，即EAFRD）的资金约955亿欧元[27]。联邦层面，德国联邦农业、食品和国土部负责政策制定、资金协调与跨部门协作，并通过行业协会培训与认证推动乡村旅游发展[28]。

州政府作为制度承接与地方创新的关键层级，在农村发展计划实施中拥有较大自主权。如巴伐利亚州将农旅产业与阿尔卑斯山区景观保护相结合，萨克森州则自20世纪90年代起逐步推进基础设施、培训体系与品牌形象的制度化建设[24]。在资金使用上，直接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规划优化整体发展环境[29]。

此外，行业协会和地方经营主体在制度层级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德国农场度假与乡村旅游全国联合会（BAG）和德国旅游协会（DTV）通过构建分层质量体系、统一品牌形象并持续开展培训，有效提升乡村旅游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农户及其所在社区则在日常运营和品牌维护中，承担起区域营销与文化再生产的职责。

综上所述，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清晰呈现出“产业功能嵌合—空间单元重构—制度层级建构”的乡村转型路径。农业与旅游的结合并非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多层级政策、空间整合与主体协同作用下形成的结构性转型机制。这一经验为理解发达国家乡村转型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五、讨论：德国乡村转型与旅游发展互动机制的总体认识

综合前文分析可以看到，德国乡村旅游并非在乡村衰退背景下被动引入的替代性产业，而是在农业现代化、城乡关系重组与多层级治理持续演进过程中，与乡村转型同步生成、相互嵌入的一种实践形态。其发展并未以削弱农业为代价，而是通过农业多功能化，将旅游嵌入既有农业生产体系和乡村社会结构，在延续农业基础功能的同时，推动乡村经济、空间与治理结构的渐进式重构。

从互动机制看，德国乡村旅游能够实现长期稳定运行，关键不在于单一市场需求或地方创新，而在于其嵌入“产业功能—空间单元—制度层级”协同演化的转型路径。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德国乡村旅游发展并非孤立的产业现象，而是战后国家重建、农业现代化、福利制度扩展以及区域治理体系演进在乡村空间中的具体体现。乡村旅游所承载的，不仅是休闲消费功能，更是国家在高度工业化背景下重新理解乡村价值、调节城乡关系并回应区域差异与社会整合需求的制度实践。由此，德国乡村旅游可被视为观察其国家变迁与乡村转型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一窗口，可以看到乡村如何由以生产为核心的功能空间，转变为承载经济、社会、生态与文化多重目标的复合治理单元。

上述分析对中国乡村转型具有重要启示。德国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并不必然导致乡村功能衰退，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农业与乡村空间、产业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将农业、旅游和社区服务纳入统一发展框架，从而避免乡村功能单一化。相比之下，中国在乡村振兴实践中亦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文旅融合”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等目标。2026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在部署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时提出，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以此培育县域特色产业、丰富乡村消费场景，并全面提升乡村生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吸引力。在这一背景下，德国以村庄为核心的空间单元重构、长期稳定的政策支撑及分层治理经验，对于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多元化、强化地方主体参与以及防止乡村旅游同质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德对比进一步揭示：德国乡村旅游的发展依托长期、稳定且分层次的政策支持，并注重地方主体的参与和社区动员；而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则强调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有机结合，政策引导与市场联动相辅相成。德国以村庄为核心的空间单元重构、制度化治理和产业多元化经验表明，乡村发展不仅需要政策推动，更需要强化地方社会资本和社区认同。在中国推进农文旅融合、乡村空间治理和乡村地域系统建设过程中，可借鉴德国经验：通过构建政策与地方实践协同的长期机制，推动农业、旅游、文化与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功能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经验对中国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可直接复制的乡村旅游模式，而在于提供一种分析视角，即将乡村旅游置于更长时段的乡村转型与国家发展进程中加以理解。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制度条件、空间组织与产业嵌合方式上的差异，乡村旅游得以成为重新审视乡村发展路径、城乡关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切入点。

参考文献

[1] 李玉恒, 阎佳玉, 武文豪, 等. 世界乡村转型历程与可持续发展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27-635.

[2] Newby H. Locality and rural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07, 20(3): 209-215.

[3] Marsden T. Exploring a rural sociology for the Fordist transition[J]. Sociologia Ruralis, 1992, 32(2-3): 209-230.

[4] Whatmore S, Munton R, Marsden T. The rural restructuring process: Emerging divisions of agricultural property rights[J]. Regional Studies, 1990, 24(3): 235-245.

[5] 胡书玲, 余斌, 王明杰. 乡村重构与转型: 西方经验及启示[J]. 地理研究, 2019, 38(12): 2833-2845.

[6] Marsden T, Lowe P, Whatmore S. Rural restructuring: Global processes and their responses[M]. London: Sage, 2023.

[7]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M]. London: Sage, 2004.

[8] Halfacree K.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M]. London: Sage, 2006.

[9] Cloke P. Conceptualizing rurality[M]. London: Sage, 2006.

[10] OCDE. The new rural paradigm: Policies and governance[R].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06.

[11] Ray C. Neo-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U[M]. London: Sage, 2006.

[12] 钱玲燕, 于靓, 张立, 等. 德国乡村的功能重构与内生型发展[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5): 6-13.

[13] 孟广文, Hans Gebhardt. 二战以来联邦德国乡村地区的发展与演变[J]. 地理学报, 2011, 66(12): 1644-1656.

[14] 韩碧君, 陆昕越, 张京祥. 城乡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借鉴初探——兼论对城乡等值化发展的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25, 40(6): 83-92.

[15] Romantische Straße Official Website. (n.d.). About us: History of the Romantic Road[EB/OL]. [2026-01-25]. https://www.romantischestrasse.de/en/about-us.

[16] OECD. OECD tourism trends and policies 2020: Germany[EB/OL]. [2026-01-12].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oecd-tourism-trends-and-policies-2020_6b47b985-en.html.

[17] Farrell M. A long-term vision for European rural areas[R].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21.

[18] Farm Holidays Bavaria. Farm holidays in Bavaria: Facts and figures[EB/OL]. [2026-01-10]. https://www.farm-holidays.com/stay-by-region/.

[19] Bayerisches Staat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Landwirtschaft und Forsten. Urlaub auf dem Bauernhof[EB/OL]. [2025-10-20]. https://www.agrarbericht-2022.bayern.de/landwirtschaft/print/urlaub-auf-dem-bauernhof.html.

[20] Wenz K, Specht J, Häring A M. Kompetenzbedarfe und Weiterbildungswege für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Diversifizierung (2): Agrartourismus [R]. Eberswalde: Hochschule für nachhaltige Entwicklung Eberswalde, 2014.

[21]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Tourismusperspektiven in ländlichen Räumen: Handlungsempfehlungen zur Förderung des Tourismus in ländlichen Räumen[R]. Berli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2013.

[22] Rein H, Schuler A. Tourismus im ländlichen Raum[M]. Wiesbaden: Springer Gabler, 2012.

[23] Franke U. Tourismus rund ums Pferd[A]//Rein H, Schuler A. Tourismus im ländlich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Gabler, 2012: 190-205.

[24] Sächsisches Landesamt für Umwelt, Landwirtschaft und Geologie. Touristische Dorfvermarktungsstrategien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Destination Dorf[R]. Dresden: Sächsisches Landesamt für Umwelt, Landwirtschaft und Geologie, 2008.

[25] Korff J, Glatzel H, Thieme M. Touristische Dorfvermarktungsstrategien: Inhalte, Erfolgsfaktoren, ökonomische Konzepte-Innovative Dorfvermarktungsstrategien in Deutschland und Europa und deren Übertragbarkeit auf Sachsen[R]. Dresden: Sächsisches Landesamt für Umwelt, Landwirtschaft und Geologie, 2008.

[26] Kossatz M, Thieme M, Vogel G. Destination Dorf?[A]//Rein H, Schuler A. Tourismus im ländlichen Raum. Wiesbaden: Springer Gabler, 2012: 273-291.

[27] European Parliament. 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How does the EU support farmers? [EB/OL]. [2025-10-10].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opics/en/article/20210916STO12704/the-eu-common-agricultural-policy-its-reform-and-future-in-brief.

[28]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rnährung und Landwirtschaft. Gemeinschaftsaufgabe Verbesserung der Agrarstruktur und des Küstenschutzes (GAK)[EB/OL]. [2025-10-07]. https://www.bmleh.de/DE/themen/laendliche-regionen/foerderung-des-laendlichen-raumes/gemeinschaftsaufgabe-agrarstruktur-kuestenschutz/gak.html.

[29] Deutscher Bundestag. Regelungen im Agrotourismus[R/OL]. [2025-10-20]. https://www.bundestag.de/resource/blob/550280/WD-5-028-18-pdf.pdf.

（责任编辑：胡英彬）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in Germany from a Rural Transformation Perspectiv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Industry-Space-Institutions"

SUN Yuhan, LI Wenho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glob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rural touris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thway for promoting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rural functions. However, rural tourism is neither a predetermined goal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nor a simple substitute for declining rural industries. Its development outcomes depend on whether it can be effectively embedded with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ystems, rur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Grounded in rural transformation theor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functional embeddedness, spatial unit restructuring, and institutional layering"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logic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rural tourism in Germany since World War II.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rural tourism in Germany was not passively introduced in response to rural decline. Instead, it emerged and evolved in parallel with rural transformation through ongoing processe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reconfigura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the evolution of multi-level governance, becoming deeply embedded in these transformations. At the industrial level, rural tourism achieves close integration with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the multifunction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t the spatial level, agri-tourism integration has driven a shift from fragmented, project-based development toward holistic spatial units centered on villages and reg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long-term financial support and regulatory frameworks established through multi-level policies at the EU, 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evels have defined development boundaries and stabilize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for rural tourism. This study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in Germany represents a concret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broader national transformation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It offers important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long-term and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a valuable analytical lens for reflecting on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pathways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transformation; Germany;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echanisms